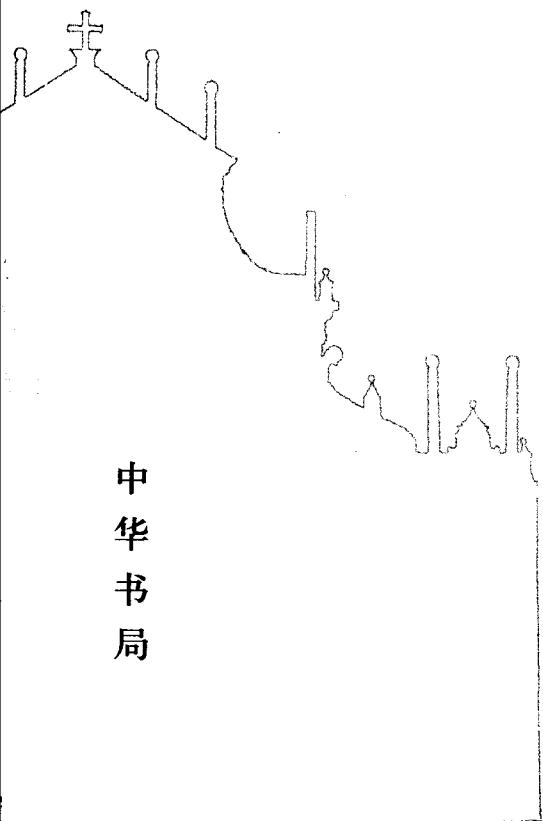


# 达尔、耶稣会史研究

戚印平 著

如果将以往对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称为正史的话，  
那么本书的论述更像是前史、外传或新编。



中华书局



# 远东耶稣会史研究

戚印平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东耶稣会史研究/戚印平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9

ISBN 978 - 7 - 101 - 05707 - 2

I. 远… II. 戚… III. 耶稣会 - 基督教史 - 研究 - 远东  
IV. B9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7831 号

---

书 名 远东耶稣会史研究  
著 者 戚印平  
责任编辑 李晨光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22 1/8 插页 2 字数 500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707 - 2  
定 价 48.00 元

---



戚印平，1954年生，浙江省上虞人，哲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著有《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远东近世耶稣会史论集》（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及论文数十篇。

# 目 录

导 论 “为了胡椒与灵魂的拯救”	
——远东耶稣会史研究的视角与方式 .....	1
第一章 一个传奇的形成与演变	
——有关使徒圣多马传教东方的若干记录与分析	
.....	9
第二章 沙勿略与中国 .....	59
附录 1 1552 年 1 月 29 日沙勿略神父于柯钦致	
欧洲耶稣会员的信件 .....	103
附录 2 1552 年 10 月 22 日沙勿略神父于上川岛致	
马六甲弗朗西斯·佩雷斯神父的信件 .....	
.....	110
第三章 “Deus”的汉语译词以及相关问题的考察 .....	114
附录 3 1551 年 10 月 20 日费尔南德斯修士	
于山口致沙勿略神父的信件 .....	160
第四章 远东耶稣会士对于汉字、汉语的若干	
记述与研究 .....	166

第五章	西方传教士关于茶与茶道的若干记述与研究	223
第六章	16世纪葡、西两国武力征服中国计划 及其教会内部的不同反应	252
第七章	关于远东耶稣会士商业活动的若干问题	301
	附录4 关于本会会员在中国与日本之间进行 贸易的报告	335
第八章	关于耶稣会驻澳门管区代表及其商业活动的若干 问题	348
	附录5 驻中国(澳门)日本管区代表规则	391
第九章	范礼安与澳门当局签订的生丝贸易契约及 相关问题	405
第十章	远东耶稣会的通信制度 ——以1587年丰臣秀吉传教士驱逐令的相关 记述为例	434
第十一章	16至17世纪的远东主教问题	467
	附录6 耶稣会的教阶职务及相关问题	563
第十二章	江户时代的“禁书制度” ——兼论汉语基督教版书籍在日本的 流传	595
	附录7 对治邪执论	634
	参考引证书目	651
	索引	667
	后记	703

## 导 论

# “为了胡椒与灵魂的拯救” ——远东耶稣会史研究的视角与方式

近年来,有关传教史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著作不断涌现,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无论是新史料的发掘、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多样化,都是以往所不能相比拟的。

与传统的研究视角相比,本书的研究可能较为异类。全书12篇文章及其附录资料,大都涉及以前不太为人关注的“边缘问题”。例如沙勿略与中国的关系、耶稣会士的商业活动、武力征服中国的计划、耶稣会内部的通信制度以及远东地区的主教任命问题等等。不仅如此,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和范畴亦颇为宽泛,正如本书的标题所示,作者试图从远东,甚至更为广阔的视角来解读历史人物与事件。如果我们将以往对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称为正史的话,那么本书的论述更像是前史、外传或新篇。

为此,我想在此对研究的基本思路作一简单说明。

其一,16—17世纪的宗教传播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冲突,并非一国一地的个别现象。在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ngus)和达·伽马(Gama, Vasco da)等人完成历史性航行之后,不同修会的天主教传教士便跟随帝国的商船与军舰,前往世界各地传播“福音”。至少从那个时候开始,文化冲突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共同问题。

与此相比,先后发生在亚洲,尤其是远东地区的宗教与文化冲突,具有更为鲜明的区域特色,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形态(封建统治)、文化传统(佛教与儒学)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价值观念与行为习惯,不仅迫使传教士们面临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与挑战,而且亦必然促使他们相互参照、借鉴或者直接利用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加之耶稣会本身的组织形态与内部机制,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经验很容易推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认知模式,进而发展为相同或相似的传教策略,并最终积淀为彼此共有的文化传统。

正如我们对沙勿略(Xavier, Santa Francisco)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虽然这位“东方传教圣徒”从未进入中国内地,但他可以从印度、马六甲、日本等地的传统实践中获得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利用汉字的特殊地位,在境外编撰出第一部中文教理说明书;而他因地制宜的策略调整和探索精神,不仅为此后范礼安(Valignano, Alessandro)的“文化适应政策”(accommodatio)奠定了基础,而且还在利玛窦(Matthoeus Ricci)等人“合儒、补儒”的传教方针中发扬光大。

另一方面,文化区域自身的有机结构也必然导致冲突之间的有机联系。例如,由于传统观念和表述习惯而爆发于中国的“礼仪之争”,不仅在文化属性与表现形式上与此前日本的“大日如来误译事件”和稍后印度的“马拉巴礼仪之争”如出一辙,而且事件本身亦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相互作用。事实上,不仅备受争议的

“天主”译名首先使用于日本的教会学校，而且率先发难、积极挑起论战，也是那些因长年传教日本而对儒家文化有深刻理解的日本耶稣会士。

其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纯粹的文化与宗教，也从来没有纯粹的文化交流与宗教传播。正如有人将葡萄牙国王的海外政策概括成“为了胡椒与灵魂的拯救”那样，西方列强在全球范围内的势力扩张包括世俗利益和精神征服的双重内容，它犹如一辆马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事实上，在大航海时代广泛使用的“征服”(conquista)一词，其本身就具有殖民统治、宗教传播以及发展海外贸易等众多含义。

由于上述时代属性，不仅前往亚洲以及世界各地的帝国军队与商人们一直与传教士相互支持、密切合作，那些传播“福音”的修道士亦通常兼有多种使命，或因此拥有不同的身份。对于这一点，传教士本人是十分清楚而自觉的。1584年6月25日，首任中国耶稣会地区长上卡布拉尔(Francisco Cabral)神父在写给国王的信中坚定不移地表态说：“我向陛下递交这份报告(武力征服中国的计划)是出于两个动机：第一，作为基督徒与修道士，我负有仕奉于神，拯救灵魂的重大责任；第二，作为陛下的臣子与耶稣会的一员，我有服务陛下的义务。”<sup>①</sup>

基于相同的义务，沙勿略会在抵达日本后写出的第一批信件中，指明建立商馆的合适地点，并同时提供了可获得丰厚利润回报的货物清单。而年轻的弗洛伊斯(Frois, Luis)修士亦在听说中国与倭寇发生激烈战斗的消息后，立即敏感地意识到蕴藏于战争背后的巨大商机，“因为中国人不能载着他们

<sup>①</sup> 凡出现于此后章节中的引文，这里不再标注出处。

的商品前往日本,这对葡萄牙人在日本的交易是极为有利的。”

当然,耶稣会士关注并积极投身于“不务正业”的商业活动,还缘于其自身的多种需求:首先,由于封建王权的强大压力,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的传教士只能将海外贸易的世俗利益作为策略性的工具,用以交换传教许可的政治筹码;其次,由于经费需求与固定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们“不得不使用我主基督赐给五块面包和二条鱼的相同方法”,以商品交易的利益来满足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如果不补充收入,耶稣会和基督徒就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传教士们可以先斩后奏,与澳门商人们签订有关生丝贸易的协定,斤斤计较于朝三暮四的生丝配额,并在澳门等地派驻专营此类事务的管区代表,在修院中设立声名远扬的“交易所”,每年赚取数千两白银的纯利。

需要指出的是,圣俗两方面的利益需求常常纠缠在一起,难以区分,加以某些更微妙的个人因素,情况会变得更为复杂;但另一方面,经济扩张的世俗使命和“福音”的宗教需要亦因此结成利益悠关、生死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并不得不接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最后结局。

其三,区域性的文化冲突及其矛盾演变并非孤立而封闭的自我体系,而是受到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与之共同构成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

众所周知,当天主教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的同时,它正受到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猛烈冲击,而发生在欧洲的文化与宗教冲突,亦在许多方面对远东传教士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产生作用;同时期召开的托兰多公会议,更是对远东耶

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sup>①</sup>。

其次,罗马教廷与各国王室之间的复杂关系,亦对远东耶稣会的传教活动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根据教宗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在1493年5月3日划定的势力范围,葡、西两国分别在这一“教皇子午线”(Demarcacion)的两端,拥有被称为“保教权”的特殊权益。他们不仅有权推荐主教人选,而且所有的传教士亦必须以国王的名义,从里斯本或马德里出发,前往远东或世界各地传教。然而,脆弱的政治同盟很快因利益之争而破裂。许多人认为,1622年成立的传信部意味着教宗试图收回传教事业的控制权。但事实表明,教廷的干预除了制造矛盾与混乱之外,对于信仰传播毫无助益。

① 在1583年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报告中,范礼安写道:“在耶稣会看来,神圣的诸公会议提倡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对孩子们的完美教育。它能够使大人们按照他们的想象引导孩子们——正如俗话说的那样——,如果从乳房中吞下道德,那么良好的教养和学问在他们长大成人后也会成为习性。”

日本人对欧洲的著者和书籍一无所知,而那些书中亦有许多绝对不宜让日本人知道的观点。理由是,这对他们来说是新奇的,有许多符合于他们(原有)宗派的观点,所以我担心他们会很容易堕落,陷入种种邪说,至少会使日本人丧失他们现在所拥有的极为优秀的单纯和素质。……因为对日本人来说,这一切都没有知道的必要,知道了反而有百害而无一利。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日本亦与其他博学者毫无联系。对他们来说,无论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或是其他权威,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上述方法极易实行。

为了让他们从孩子时代就领会优秀的教义,我们不应以异教的诗和西塞罗的文章教授拉丁语,而必须依据那些憎恨恶德、记载着基督教德操和出色宗教材料的书籍。……这些书不能记载目前欧洲异教之书中的谎言和恶德。这些记录在早期教会时代曾拥有权威,所以无法禁止,而日本对此一无所知。应当根据我们的方针引入好书。带来这些坏书是极不恰当而有害的。这些新编的书籍应该在日本印刷,并严格禁止我们在日本的耶稣会员在日本教授其他东西。”范礼安:《日本巡察记》,松田毅一译注,平凡社,东洋文库,1985,第77、78—79页。

必须留意的是，王权与教权的矛盾在远东地区延伸并发展成为“传教权”的特殊形式。与葡萄牙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耶稣会一直谋求独占日本和中国的传教特权，而受控于西班牙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以及奥古斯丁会士，则千方百计地渗透挤占前者的传统领地。当葡、西两国在 1580 年合并之后，双方的矛盾冲突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趋向高潮，并最终导致日本幕府采取禁教与锁国的极端措施。

如果进一步拓展视野，我们很容易发现对传教事业产生深刻影响的许多世俗事件。例如 1575 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这个远东港口不仅标志着葡萄牙海外帝国最终确立、世界贸易体系的大致形成，而且意味着远东耶稣会士获得了一个稳定的根据地，他们能够通过定期航船制度，于商业活动中获得经费来源。因此，当澳日贸易断绝之后，不仅澳门从繁荣走向衰败，耶稣会在远东的传教事业亦无可挽回地趋于没落。

关于对传教事业产生重要影响的不同因素，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如 1588 年，“无敌舰队”(Inuincible Armada) 远征英国时的全军覆灭；16 世纪末新教徒国家荷兰与英国的强势进入等等。错综复杂的事物关联及其相互作用，在不同的情境中呈现出万花筒一般的各种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事实上，各种因素的交叉互动就如同一个复杂的能量场，相互作用，且难分彼此。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全球化、一体化，其历史进程的真正起点就在于此。说得再形象一些，正是从那里开始，亚玛逊森林中蝴蝶翅膀的颤动已经可以在太平洋彼岸引起震荡和回响。

基于上述认识，作者相信，相对封闭而单一的传统研究模式不足以获得对于历史的完整认识与理解。说得更直白一些，中国教会史或中国传教史的考察，决不能自囿于国境线以内的有限范畴，而应当置于远东、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并相互印证；也惟有如此，才能更为深刻、准确地把握中国教

会史和传教史的自身特点与本质所在。

另一方面,为了展示并说明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作者放弃了令人振奋的宏观建构,研究的目的也不再指向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概念,而是试图通过一系列具体问题的个案分析,描述人物与事件的具体情境,以及它们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的变化过程;作者的研究目的不在于推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或一般性概念,而是致力寻求并突显不同人物与事件在具体情境中的差异,描述非此即彼的变化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情境与我们以往较多使用的环境一词有所不同,如果说后者更多地强调外在客观的物质因素,那么前者则更强调行为主体的精神需求与心理变化。我们会努力构建产生问题的特定环境,分析客观需要和自由意志之间的差异,关注这两者如何达成妥协与平衡,又如何体现于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改变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情境逻辑并不意味着忽略外在客观因素的作用,相反,我们一直努力证明,自由意志的有效范畴非常有限,事态的变化也常常出人预料。在许多时候,宗教传播和文化冲突的实际状态与发展趋势总是事与愿违,它并不契合于有心栽花的理想动机,而通常是无心插柳的意外结局。

正因为如此,我们还强调并关注过程,试图尽可能详细地区别并分析特定情境中不断变化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我们相信,历史事件、人物以及具体问题的意义与性质,常常在这一流变的过程中得以彰显,而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作用,亦由此得以展示。变化不会结束,过程永无止境。历史深处的蝴蝶,至今还在我们的身边和心灵中飞舞颤动。



## 第一 章

# 一个传奇的形成与演变 ——有关使徒圣多马传教东方的 若干记录与分析

在大航海时代的许多西方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则颇为神奇的传奇故事,即使徒圣多马(St. Thomas,一译圣多默、圣托马斯)曾奉命前往东方传教、甚至抵达遥远的中国,在那里传播福音。随着西方各国在亚洲的势力扩张以及传教士传教活动的蓬勃展开,这个故事越来越受人关注,并在好事者们的津津乐道与相关证据的发掘整理中,不断得到补充与完善。

—

使徒圣多马传教东方的故事可能初成于中世纪或更早时

期<sup>①</sup>,但首先以亲历者身份、向西方人讲述圣使徒在印度的陵墓及其种种灵异奇迹的人,很可能是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这位威尼斯商人在其《游记》(1299年刊)中这样写道:

圣多玛斯(Saint Thomas, 即圣多马)教长之遗体,在此马八儿(Maabār, 马拉巴尔)州中一人烟甚少之小城内,其地偏僻,商人至此城者甚稀,然基督徒及回教徒常至此城巡礼,回教徒对之礼奉甚至,谓之为回教大预言人之一,而名之曰阿瓦连(Avari-an),法兰西语犹言圣人也。基督教徒至此城巡礼者,在此圣者被害之处取土,使患四日热或三日热之病人服之,赖有天主及此圣者之佑,其疾立愈。基督诞生后1288年时。此城有一极大灵异,请为君等述之。

此地有一藩方,屯米甚多,皆屯于礼拜堂周围之诸房屋中。看守礼拜堂之基督教徒忧甚,盖诸房屋即尽屯米粮,巡礼人不复有息宿之所,数请于藩方,请空屯米之屋。而藩主不从。某夜,圣者见形,手持一杖置于藩主之口,而语之曰:“若汝不空余屋,俾巡礼之人得以息宿,汝将不得善终。”

---

① 圣多马为耶稣基督的12门徒之一。在外典《圣多马福音书》中,就有关于他前往印度传教的蛛丝马迹。最早将这些线索演绎成传奇故事的始作俑者,可能是同时代或稍晚些的摩尔人。根据他们的描述,使徒圣多马为向印度人传教而前往南部印度,并于公元68年(一说72年)在马特拉斯郊外的马拉巴尔殉教。摩尔人的这一传说在罗马教皇凯拉西乌斯一世(在位492—496年)时被列为禁书,但自从636年塞维利亚的伊西得尔(Isidor da Sevilla)认为马拉巴尔是圣徒的殉教地之后,相关的各种传说广泛流行。参见林斯霍腾(Lin'schoten, Jan Huyghen van):《东方案内记》,岩生成一等译,《大航海时代丛书》,第1期,Ⅷ,岩波书店,1978,第165—157页注释6。

又冯承钧先生在翻译《马可波罗行纪》时亦有相关译注和按语。参见《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第429—430页。

及曙，藩主畏死，立将所屯之米运出，并将圣者见形之事告人。基督教徒对此灵异大为庆幸，皆感天主及使徒圣多玛斯之恩。尚有其他大灵异屡屡发生，如疾病、残废及种种病苦之获痊愈之类，尤以对于基督教徒最为灵验。

看守礼拜堂之基督教徒所言圣者死事，兹为君等述之。据说圣者昔在林中隐庐祷颂，周围孔雀甚多，盖他处孔雀之众无逾此地者也。此地有一偶像教徒，属于上述之果维(Govis)族者，持弓矢猎取圣者左右之孔雀，发矢射雀，误中圣者之身，圣者立死。圣者死前曾传道奴比亚(Nubie)之地，土人皈依耶稣基督之教者，为数甚众。<sup>①</sup>

马可·波罗没有详细记写圣使徒印度传教的行历，也没有注明消息的具体来源，但从他1291年曾奉命于福建泉州护送元公主去往伊利汗国的经历推测，他可能是在与南亚次大陆商人的接触中获得类似传说的。<sup>②</sup>

众所周知，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版在欧洲引起巨大轰动，它的广泛影响被认为是促成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ngus)和达·伽马(Gama, Vasco da)等人完成历史性航行的动力之一。与此同时，圣使徒传教东方的故事亦不胫而走，深入人心，甚至有许多虔信者将这个传说与圣经中的某些只言片语联系在一起，视之为使徒远行东方的预言和暗示。

与《游记》中许多异域风情的猎奇性描述不同，圣多马传奇的功用在于第一次在两种不同文明间构筑起某种精神联系，为欧洲的世俗读者以及虔诚而狂热的教会人士，提供了展开丰富想象的诱因，使他们有理由相信，早在千余年前的使徒时代，作

<sup>①</sup> 《马可波罗行纪》，第428页。

<sup>②</sup> 参见邬国义：《马可波罗行纪·前言》，《马可波罗行记》，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1页。